

论国民军在北伐战争期间的历史作用

王
宗
华

1924年北京政变后成立的国民军,在冯玉祥的率领下,在国共两党和苏联的帮助下,逐渐转向革命,成为南方国民革命军的一支友军。北伐战争期间,这支部队的政治倾向及其活动对于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探讨这支部队在北伐战争期间的历史作用,对于深入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根据国民军在北伐战争期间的政治倾向和活动情况,分为三个阶段考察其历史作用:一、从北伐出师前后国民军坚持在北方三个战场的作战到南口战败;二、从五原誓师到与北伐军会师中原;三、从郑州会议到国民军“分共”。

(一)

北伐战争前夕,1925年冬至1926年春,北方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25年12月下旬,在全国人民反奉运动中,国民军打败奉系李景林,占领了天津。国民军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先后任命宋哲元为热河都统,孙岳为直隶督办兼省长,李纪才为山东查办使。至此,国民军除原来控制的京畿地区、绥远和察哈尔两个特别区以及河南、陕西、甘肃三省外,进而控制了热河特别区、直隶及山东的一部分。国民军的势力空前地扩大了。与此同时,北方革命运动也掀起了高潮。11月下旬,北京爆发了被称为“首都革命”的倒段反奉示威运动。国民军势力的发展和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涨,促使直奉军阀迅速联合起来对付革命势力。1926年1月,直奉军阀实现了以讨伐“南北二赤”为目的的反革命联合。他们企图首先消灭北方国民军,然后推翻广州国民政府。在此形势下,冯玉祥为了使直奉军阀失去进攻的借口,保全国民军的实力,采取引退的办法,于1926

年1月1日通电下野。可是,直奉军阀并不因此而停止实行其消灭国民军的计划。1月20日前后,直奉军即分别从山东、河南、直隶三处向国民军发动进攻。国民军被迫从山东撤回河南,随后在河南遭到严重的失败。3月22日国民军撤出天津,接着4月15日又从北京退守南口一线。

从4月下旬开始,直、奉、晋军阀联合进攻南口——晋北一线的国民军。与此同时,吴佩孚任命镇嵩军头目刘镇华为讨贼联军陕甘军总司令,委任陇东领导使张兆钾、陇南镇守使孔繁锦为援甘总司令和副司令,策动

他们出兵消灭驻陕甘的国民军。刘镇华于4月中旬开始了对驻陕西国民军的进攻。张兆钾、孔繁锦也于5月中旬开始进攻驻甘肃国民军。于是,国民军被迫在北方南口——晋北、陕西、甘肃三个战场上与直奉晋军阀联军作战。

这时,1926年春,广州国民政府已经统一了广东全省,两广的统一也已实现,进行北伐战争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了。国民军在北方三个战场上的作战,牵制了直奉军阀的大量兵力,为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这年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在分析当时全国的形势时，就已看到了广州国民政府的前途与北方国民军的命运密切相关着。会议认为：“英日帝国主义者竭尽全力以资助直奉军阀向国民军、国民政府、人民进攻。如果吴张势力战胜，全国政局必定转到极反动的局面，那时仅广州政府孤单作战，处于四面反动势力包围之中，也许因此而失败；另一方面，如果国民军现时能支持得住北方现有的局面，广州政府在几个月的相当准备后，必然对于北伐更有胜利的把握。”因此，“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①这就是说，国民军在北方坚持战斗，对于广州国民政府准备出师北伐是极为有利的。

到了南口——晋北战役的时候，形势更为明显。直奉军阀若得胜，吴佩孚必全军南下推翻广州政府。因此，乘国民军尚在南口等地抵抗，吴军大部主力尚在北方的时候，发动北伐战争，对国民革命军最为有利，否则就将错过有利的时机。当时国民革命军有些高级将领已看到了这个有利时机。据李宗仁回忆，1926年5月间，他向蒋介石等人陈述了抓住时机从速出师北伐的三点理由。其第一点就是从分析北方各军阀的形势而来的。他认为：吴佩孚“正联络奉张，挥军北上进攻冯玉祥国民军。国民军一旦瓦解，吴的势力也必复振。既振之后，必乘战胜的余威，增兵入湘扫荡唐生智所部，从而南窥两粤。我们现在如不乘国民军尚在南口抵抗，吴军主力尚在华北，首尾不能相顾之时，予以雷霆万钧的一击，到吴坐大，在南北两战场获得全胜，巩固三湘之后，孙传芳不敢不和吴氏一致行动，那我们北伐的时机将一去不复返，以后只有坐困两粤，以待吴孙的南征了。”^②李宗仁的建议得到李济深等人的支持。6月4日，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案。显然，国民军在北方的战斗，造成了广州政府出师北伐的有利时机，对国民党中

央决定出师北伐起了促进作用。

国民党中央决定出师北伐时，加伦将军回到了广州。国民革命军接受了他提出的对敌人各个击破的建议，确定了北伐的第一步采取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的战略方针。根据这个方针拟定的作战计划是首先集中兵力打击吴佩孚在两湖的军队，攻占武汉，然后与国民军会合；对孙传芳部暂取守势，以部分兵力对江西进行监视，并留一部分军队护卫闽粤边境。其所以采取这样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固然是因为吴佩孚已派兵入湘进攻唐生智所部，将乘胜进攻广东，是国民政府当前首要的敌人，同时也因为打击吴佩孚，进军两湖，能与国民军配合作战，进而能与国民军会合。7月1日，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动员令规定，“爰集大军，先定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国民军会师，以期统一中国，复兴民族。”^③可见，国民军在北方对直奉军阀的作战，对于国民革命军确定其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也是有影响的。

北伐战争从5、6月间先遣部队在湘南作战开始到国民军于8月中旬从南口撤退为止这一段时间里，国民军在南口——晋北一线牵制了吴的大部分主力部队。同时，陕西方面的国民军也牵制了刘镇华的部队约10万人。吴佩孚配置在两湖的部队主要是叶开鑫所部湘军及湘鄂边防督办、援湘军总司令李倬章统率的四路援湘军，部队虽然不少，但战斗力不强。国民军在北方作战牵制了吴军兵力，减少了北伐军进军的阻力，而吴佩孚则处于南北两线作战、顾此失彼的不利条件下。当吴军在南方战场失利时，陈嘉谟等一再电促吴南下。但他如率部南下，放弃进攻南口，将无法继续控制北京政权，京汉线北段地盘也将被奉军乘虚席卷而去。加上他对国民军的深刻仇恨，使他不愿中途罢手。因此他回电说：“南口一日不下，则本总司令一日不能南下。”^④他命令在湘部队固守从平江到岳阳一线，准备打下南口后再率部南下

反攻长沙。但北伐军于8月19日发动了平江战役，当天攻克平江，22日占领岳阳，接着又占领了鄂南的通城、崇阳、蒲圻等地，与吴军相持于汀泗桥，使吴军坚守平江岳阳的一线的计划落空。吴佩孚在占领南口后，率部分主力南下，8月25日到达汉口，这时形势对他已很不利了。26日，吴在汉口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坚守汀泗桥、咸宁一线，确保武汉安全，准备反攻。但是，27日上午汀泗桥即被北伐军攻克。北伐军并乘胜占领了咸宁，接着又于30日取得贺胜桥决战的胜利。吴军大败，狼狈溃退，从此一蹶不振。

由此可见，国民军在北方的作战，主要是在南口的作战，对北伐军在两湖的胜利进军起了重要的战略配合作用。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南口战役“牵制奉军、直军50万之众不能南下守鄂，”使北伐军得以“顺利出湖南，破竹之势消灭反革命势力进入武汉，是北伐成功，多赖南口死难烈士，其功不可没。”^⑤

国民军在南口作战使直奉军遭到很大损失，如吴军田维勤部在5月间尚有5万余人，至战役结束时仅余15000人。奉军在8月1日以后的5天内就损伤15000人。南口战役中“反国民军各军伤亡之数5万以上。”^⑥

国民军在南口作战还使吴佩孚与孙传芳之间及吴军内部的矛盾激化。孙传芳在1925年浙奉战争期间是联冯反奉的。这时他对吴军进攻国民军不予支持，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孙电促吴南下，而吴拒不南下，反催促孙出兵由福建进攻广东，由江西进攻湖南。孙于7月27日回电说：“目前赣闽吃紧，对湘事不能统筹兼顾，只能为相当之援助，仍请我帅自行主持。”^⑦孙表示不愿与吴合作，对湖南战争采取坐观成败的态度，避免卷进去。这样就使吴军得不到孙传芳的配合。同时吴佩孚与其部下靳云鹗等之间也存在着联奉反冯与联冯反奉的分歧。吴军在南口对国民军的进攻使他们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吴撤了靳云鹗的讨贼联军副总司令的职务，但靳的部下

仍暗中与他联系，不听吴的调遣。7月中旬，湖南战争吃紧，吴调陈文钊师南下增援，陈拒不听命。南口战役结束后，吴调高汝桐、阎日仁两师南下。但兵车开到新店就停了下来，营长以上军官上鸡公山请靳云鹗下山，否则部队不动，吴只得恢复靳的职务，待电报到后部队才继续南下，但已错过了战机，使汀泗桥战役中吴军不能及时得到增援。

国民军从南口撤退时，陕西和甘肃战场的国民军仍在坚持战斗。陕西的国民军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坚守西安、三原等地，使刘镇华军日益疲惫，无力支援吴佩孚，对北伐军的进军继续起着战略配合的作用。甘肃国民军在吉鸿昌等部支援下，于8月底打败了张兆铨和孔繁锦，基本上稳定了甘肃的局势，使南口败退下来的国民军有一条退路，使国民军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后方根据地，对以后国民军的再起具有重要意义。

(二)

当国民军在南口作战时，冯玉祥正在苏联考察。这时他已经徐谦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并于6月间派刘骥等为代表由莫斯科去广州与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接洽共同革命的计划。刘骥于7月中旬到达广州后与谭延闿、宋子文、孙科等人达成了国民军接受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从北方协助国民革命军北伐，国民政府对于国民军则按照国民革命军的标准一律待遇的协议^⑧。8月17日，冯离苏联回国。23日被任命为国民军的国民党党代表、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9月16日，冯到达五原，17日与在五原的国民军将领举行会议，会上决定成立国民军联军，并推冯为总司令。同日举行了誓师大会，冯就任联军总司令职，同时宣布国民军全体将士加入国民党。他代表全军宣誓，并向全国发表宣言，宣告：“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⑨五原誓师表明国民军开始从南口战役后土崩瓦解的局

面下重新振作起来，标志着这支从军阀军队中分化出来的部队正式加入了国民革命的行列。

这时，北伐战争已推进到武汉和江西境内，吴佩孚的主力已受到沉重打击，但武昌尚未克复，湖北境内的敌军也未肃清。在江西战场上，北伐军于9月19日攻入南昌，22日又败退下来。孙传芳的气焰还很嚣张。北伐前途尚难预测。在此形势下，国民军誓师五原，加入革命行列，壮大了革命统一战线，使革命势力扩展到了黄河流域，其政治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鼓舞了革命人民的斗志，让人们看到直奉军阀消灭“南北二赤”的计划彻底破产，同时也促进了敌人阵营的分化。在吴佩孚溃败，国民军再起的形势下，阎锡山、商震开始动摇，“皆渐与冯表示好感。”^⑩阎派代表到包头见冯玉祥，表示“很想热诚援助”。不久，“从山西送来一万套服装、五十万现款和许多枪弹。”^⑪

五原誓师后，国民军接受李大钊出宁夏，取潼关，而后会师北伐的建议，制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作了进军陕西、解西安之围的部署。这时，甘肃已基本平定。冯玉祥任命孙良诚为援陕总指挥，率甘肃方面国民军进军陕西；任命方振武为援陕副总指挥，率五原方面国民军南下援陕。同时任命部金声为东路军总指挥，率石友三等部留驻包头，防备奉军袭击。11月上旬，两路援陕军会师。23日占领咸阳，随后分三路向围困西安的刘镇华军发动进攻。27日西安解围。12月2日占领潼关。至此，刘镇华军全部被赶出了陕西。

西安解围使陕西回到国民军手中，扩大和巩固了国民军西北根据地。国民军得以在这块根据地从容整训部队，恢复力量，准备出师参加北伐。在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冯玉祥整编了部队，加强了部队的军事训练和政治工作。为了培养政治、军事干部，举办了政治训练队，创办了中山学院和中山军事学校。同时还创办了《新国民

军周报》等多种报刊，组织学习组、士兵自治会等群众组织，举行时事报告会、演讲会等活动，开展政治宣传教育工作，以灌输革命思想，提高士兵的政治觉悟。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国民军联军作好了出师北伐的准备。

国民军在西北的胜利使西北形势改观，并给全国军事政治形势以重大的影响。国民军据有陕西，并与甘肃和绥远的一部分连成一片，与南方北伐军遥相呼应。这个新形势对于奉系军阀是个新的威胁。当时，12月5日，中共中央就指出：“冯玉祥西北之再起——可以随时威吓奉军不敢疏南口之防，不敢存长驱南下而无顾忌之野心。”张作霖“看得国民军在西北之发展较之北伐军之前进尤为重要。”“现时拟集中注意消灭国民军在西北之存在，刻奉张正汲汲逼迫晋阎与其合力进行此计划。”^⑫但是阎锡山这时更加感受到国民军对他的威胁而不得不对国民军采取亲善的态度，派代表与冯联络，并在运城赵村设立国民军晋军联合办事处，以保持密切的联系。阎对奉系则采取虚与委蛇的态度。1926年12月1日，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曾请阎出任副总司令，阎不表示拒绝，也不就职，仍派代表常驻北京敷衍奉系，以便拖延时间，观望时局的发展变化。

国民军在西北的胜利，对于吴佩孚更是严重的威胁，造成吴军濒于土崩瓦解的境地。吴佩孚败退洛阳后，自己无力反攻武汉，为保住河南地盘，他又反对奉军通过河南南下。12月初，奉军已进至直豫边境，急于南下，直奉矛盾尖锐起来。同时，西安解围后，国民军已进入豫境，成为吴军的主要威胁。12月6日，吴佩孚在郑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抵御国民军的问题。靳云鹗主张和冯反奉。吴佩孚坚持与国民军为敌，派田维勤为援陕全军总司令，张治公为前敌总指挥。但命令发表后，各军借口缺粮缺饷不能进兵。吴下令解除靳云鹗讨贼联军副总司令职，派寇英杰继任，令寇率师南下接收靳部。寇军与靳

部在郾城、西平一带激战，豫南陷入一片混乱状态。靳部任应岐在许昌宣布就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职。靳之鹗、魏益三也暗中投向国民革命军。吴佩孚已是众叛亲离。

以上情况表明：国民军向陕西进军及其胜利造成的新形势有利于革命的发展，使北伐军能集中兵力东进，对北伐军取得江西、福建、浙江等战场的胜利起了战略配合作用。

国民军在陕西的胜利也促进了陕西革命高潮迅速到来。西安解围后，陕西全境基本上统一在国民军联军的旗帜之下。1927年1月，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成立，它是陕西省的临时权力机构。中国共产党派了魏野畴、史可轩、杨明轩、王尚德等党员担任政治部副部长、政治保卫部部长、教育厅厅长、出版局局长等重要职务。这个临时政权机构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革命政权。党通过这个政权组织领导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使陕西出现了革命高潮。这时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对工农运动还比较重视。他要求各地驻军协助组织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团、工会等组织，并帮助这些组织解决困难问题，从而为党发动和组织工农运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3月27日，陕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成立。在它的领导下，各地农民运动迅速走向高潮。在此同时，3月29日，陕西省总工会正式成立。到5月底全省有50余县建立了农民协会，农会会员约37万人。5月30日，陕西省农民协会成立。随着农会组织的发展，农村中掀起了革命高潮。国民军的胜利推动了陕西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促进了陕西革命根据地的巩固，支援了国民军联军的北伐。陕西的革命高潮与武汉地区的革命高潮遥相呼应，壮大了武汉政府的革命声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出现了北京、南京、武汉三个政权鼎立的局面。武汉政府内部有东征与北伐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决定继续北伐。而“所谓北上的中心思想，

是想避开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接冯玉祥出来，与国际打通。”^⑩可见，国民军在西北的存在客观上对武汉政府作出继续北伐的错误决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927年4月19日，武汉政府在武昌南湖誓师北伐。4月26日，武汉政府将国民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命冯玉祥为总司令，并令冯督师出潼关参加北伐。5月1日，冯在西安红城召开军民大会宣誓就职。6日，移驻潼关，挥师东进。这时敌军处于南面武汉北伐军和西面冯玉祥部夹击的不利形势下。奉军的计划是在最短时间内沿京汉路打败武汉北伐军，将它赶到武胜关以南，然后回师陇海路进攻国民军。因此，奉军以其大部分兵力和精锐部队迎击武汉北伐军，而对西面取守势，只派少量部队防守洛阳一带。于是冯军所面对的敌军兵力较小，主要是张治公部和奉军万福麟部五个旅。冯军在兵力上占了优势，又得到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援，因而进展顺利，师出潼关后连克灵宝、陕州等县。张治公等部退守铁门、新安一带。冯军发动猛攻，22日克新安，23日进至磁涧，与奉军万福麟部及张治公残部4万人激战数日，敌军败退。冯军26日占领洛阳，29日在黑石关击败奉军增援部队，30日克孝义，同日骑兵部队进至郑州，6月1日与武汉北伐军在郑州会师。冯军实现了自己的战略计划，成功地配合武汉北伐军迅速取得第二次北伐的胜利。这次北伐虽然打败了奉军，把它赶到黄河以北，但是革命形势并未由此好转。

（三）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宁汉对立的形势下，冯玉祥成为宁汉双方争取的对象，而他则与两方都保持联系，态度暧昧。郑州会师时，冯因收编了很多部队，兵力有很大扩充，又占据中原战略要地，使他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武汉政府在敌人包围、封锁和内部动摇、叛变的情况下，“把最后的希望押

在冯玉祥身上。”^④6月1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任命冯玉祥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主席。6月5日，汪精卫、徐谦、谭延闿、顾孟余、孙科等武汉政府要人都北上与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汪精卫集团为了拉冯反共反蒋尽量满足冯的愿望。会议决定：组织开封政治分会，以冯为主席；成立河南、陕西、甘肃三省政府委员会，分别以冯玉祥、于右任、刘郁芬为主席；同意冯所部扩编为七个方面军，唐生智所部全部撤回武汉，巩固后方，河南军事由冯负责。于是，第二次北伐的胜利果实为冯所独占。但冯对武汉政府不能满足他的军费要求仍很不满。冯在反共问题上与汪、谭等取得一致，而在反蒋问题上却不表态，只是表示希望革命队伍加强团结，齐心协力完成革命大业，实际上他是要联蒋反奉。“于是武汉去的这些人一连串地跑回来。这时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顾孟余等态度全变了，国民党的人更加动摇了。”^⑤

冯玉祥之转向反动不是偶然的。如前所述，冯在国共两党和苏联的帮助下，思想上是有进步的。从五原誓师到出潼关北伐的行动表现基本上也是好的。但是，他的旧思想没有得到改造，革命立场不坚定，一遇风浪就要动摇，加之外力的推动，就要背叛革命。他对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理论的认识都很肤浅，甚至有些错误的观念，如他否认中国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他认为：“全国并无阶级可分，斗争何有。否则，必演成民与民间之仇杀，使社会大乱而已！故在中国只有国民革命，断无阶级斗争。”^⑥正因为他有这个错误观念，所以在郑州会议上，当汪精卫集团攻击共产党搞阶级斗争，弄得人心惶惶，秩序大乱，叫嚷要严厉制裁共产党时，他就必然受其影响而在反共问题上与他们合拍了。同时，冯玉祥的根深蒂固的把军队看得重于一切的军阀思想仍然支配着他的行动，如他原来支持组织农会工会、发动工农运动，但是当工农运动发展起来后，他又

认为工农运动的发展妨碍了税收和军队给养的供给，于是他又转而压制工农运动。因此，当他在郑州会议的会内会外听到徐谦、何键等人发泄对工农运动的不满，诬蔑农民运动使湖南官兵在外都不安心，急着要回老家去时，他就不能不大受其影响，从而促使他反对工农运动，反对共产党。

至于冯玉祥不同意反蒋，而希望宁汉息争，一致北伐，固然是由于他对蒋介石的错误认识及他反奉的要求，同时也由于他面临的困难和他的“军事第一”的军阀思想。当时，他的兵力虽有很大的扩充，但他原来的部队元气还没有完全恢复，同时粮饷都很缺乏，“给养困难，已达万分”^⑦，而大量收编的部队要粮要款甚急，否则不服从命令，不听调遣，甚至与敌人相勾结。在这种情况下，他担心奉鲁军阀利用宁汉对立的形势卷土重来，而他的部队首当其冲，孤立无援，会经不住打击而再度失败。6月30日，他在劝告宁汉双方的电报中明白地表明了他的这种担心。他说：宁汉双方愈形决裂，军阀于是乘隙卷土重来，“当此军事紧急之时，江汉既不出兵，津浦亦不北进，仅玉祥部队单独抵御，势之危险，莫甚于此。”^⑧冯玉祥还保留着视自己的军队如同生命的军阀思想，他绝不愿承担这样的风险，更何况他如反蒋将使他增加一个强敌，对他更为不利。因此，他不但不同意反蒋还要联蒋共同北伐。

郑州会议后，冯玉祥与蒋介石约定在徐州会见。蒋面对奉鲁军阀与武汉方面的威胁正力图把冯拉过去，因而对冯极力表示尊重。6月19日，他亲自远迎冯于距徐东六十里的郝寨车站，赠冯50万元犒军；对冯的困难表示竭尽全力相助，答应自7月份起按月接济冯军饷250万元，解决了武汉方面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冯原有联蒋北伐之意，至此对蒋更产生了好感，于是表示“今后共同前进，一切惟蒋总司令之命是听”^⑨。20日，冯与蒋介石、胡汉民、吴雅晖、李宗仁等举行徐州会

(下转第49页)

夺取胜利。

这种“智能性”表现在“人——证据”系统上也是这样。证据信息往往随着案情的十分复杂、变化多端而也显得极其复杂而变化多端。这时，司法人员就必须充分发挥人的智能性，掌握控制权，通过现象直入证据的最深层，及时准确地取得信息，解决问题。例如，在证据的调查过程中，出现了新情况：被告人自杀了，现场破坏了，线索中断了，物证毁灭、隐藏了，旧案未了，新案又发生等等。这时，人的智能性便应充分发挥，决不能惊慌失措，束手无策，为困难所吓倒。应冷静分析，迎难而上，既要充分看到困难情况，更要全面估计有利条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果敢迅速地采取有效措施把问题一个个正确解决。

以上“三论”相互作用，相互依存构成一个科学的整体，用它的新的观点、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指导证据学，一定会给我们开辟一个广阔的前景，把证据学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使我们的审判工作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illegible]

上接第55页

议。会议在宁汉合作、清党、驱逐鲍罗廷、共同北伐等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会后，21日，冯与蒋介石联衔发出坚持北伐的通电。同日，冯致电汪精卫、谭延闿等，攻击武汉地区工农运动，要求促使已被解职的鲍罗廷回国，要求“在武汉之国民政府委员，除愿出洋暂资休息者外，余均可合而为一。”^②这实际上就是要武汉政府自动取消而合并于南京政府。这个通电对于正在准备东征讨蒋的武汉政府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冯玉祥在徐州会议结束后，立即下令“分共”，将苏联顾问解聘，将他的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和他的辖区内的地方党员干部集中起来送到武胜关。国民军联军的“分共”标志着它的性质的变化。至此，国民军联军不仅改变了名称，而且性质也起了变化，它不再是一支革命的军队，而成了国民党新军阀的一支部队。

冯玉祥和国民军的转向反动加快了汪精卫集团走向反革命的步伐。汪精卫集团于7月15日举行分共会议，通过了“分共”的有关决议和命令。接着7月20日，冯玉祥向宁汉双方发出调停通电。冯的调停对宁汉之间的谅解起了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在北伐战争期间，国民军的历史作用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当国民军倾向革命和正式加入国民革命

行列时，它对于北伐的出师，北伐军的胜利进军，第二期北伐的胜利，以及革命统一战线的壮大，西北地区革命运动的高涨等都起了重要的战略配合作用或促进作用，这是它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当国民军转向反动时，因其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汪精卫集团加快反革命的步伐，对于宁汉合流的实现也有恶劣的影响。

注释:

①⑩⑫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第46—47、369、362页。

② 《李宗仁回忆录》，第301—302页。

③ 《革命文献》第12辑，第32页。

④⑤ 陈森甫：《细说西北军》，第385、386页。

⑥ 蒋鸿遇：《国民军二十年奋斗史》第3编，第116—117页。

⑦ 转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2辑，第124页。

⑧ 参见刘骥：《南行使命》，《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⑨ 《向导》第177期，第1835—1837页。

⑪ 宣侠父：《西北远征记》，第126页。

⑬⑭⑮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0页。

①⑥ 《冯玉祥选集》上卷，第45页。

⑮ 转引自高兴亚：《冯玉祥将军》，第107页。

⑪ 《冯玉祥军事要电汇编》第2编卷8,第18—19页。

①9 《徐州会议与国民革命》，第56页。

②① 《国闻周报》第4卷第25期。